

谭云明 / 著

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

萬國公報

CCTV

人民日報

每週評論

光明日報

解放軍報

文匯報

南方日報

新華日報



時報

申報

深圳特區報

京報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工人日報

新青年

大公報

新民報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譚云明／著

二十世紀影响中国的媒体

萬國公報



人民日報

每週評論

光明日報

解放軍報

文匯報

南方日報



解放日報



北京日報

申報

深圳特區報

京報

中國青年報

工人日報

新青年

大公報

新民報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谭云明等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80170-556-3

I. 二… II. 谭… III. 传播媒介—概况—中国—20 世纪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0942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乔 平
校 对 郭 雪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 场 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印张 2 插页 25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序 言

寻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契合

丁柏铨*

大约半年多前，中央财经大学新闻传播系谭云明博士曾跟我说起，正在撰写一本《20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的书，到时请为之作序云云。当时我并未深想，只是觉得却之不恭，便应承了下来。2007年夏的某日，云明博士果真将《20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书稿的电子文本，发到了我的邮箱。由于电子文本较为庞大，我的邮箱曾一度为之瘫痪，以致几日内不能正常收信和发信，让我饱尝了不能用电子邮件与外界交流、沟通的苦涩滋味。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小插曲，我对该书的阅读兴趣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应当说，阅读《20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的书稿，是一件让人颇感愉快的事情。借此，既可以了解20世纪中国新闻媒体发展的轨迹和轮廓，了解其前进的足迹和行进中的艰难曲折，进一步增进对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分支的了解（这对于我这样的并不专门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来说，无疑是很有裨益的，相信广大读者也会感到开卷有益）；又可以从杰出的媒体和出色的新闻人身上，汲取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丰富的精神养料，或者也可以由特定媒体而感悟到其特殊的认识价值；还可以从全书生动的文字表述中，获

* 丁柏铨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得阅读享受。真可谓一举多得。

然而，当即将面世的著作的读者乃至第一读者，与为该著作序，两者绝对不是一码事。当读者，只要认真阅读、评判并从中有所摄取即可；有所感，想褒贬，可以尽兴议论一番，或慷慨激昂，或持论稳健，或聚于一点，或纵横捭阖。但议论归议论，并不在白纸上留下黑字，故可以从心所欲，一吐为快。当某著的第一读者，能感受到作者的特别厚爱，因此阅读时必须担当起对作者负有的那份责任。但仅此而已。为别人的大著作序，理应对著作本身的内容和其所涉足的领域有相当的了解，并进而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而看到云明博士的书稿以后我才明白，《20 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其实是一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新闻史性质的著作。在中国新闻史的广阔天地中，我所知甚少，不敢发表什么意见，更不敢说为这方面的著作作序了。我甚至后悔当初的应承太过草率，缺乏自知之明。但是，我终究不能食言，更何况我于云明博士而言有着亦师亦友的双重身份。

这篇序，是我鼓足勇气写成的。

通过阅读《20 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我深感其作者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云明博士在此书的酝酿阶段，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写作初衷：“遵循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的原则，以新闻人物或事件为圆点，展开对 20 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的描述和反思。不求对新闻媒体的全面描述，但求传媒灵魂的抒写，力求故事化、人物化、细节化，讲究趣味性、奇异性。按历史发展的顺序，选择每一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新闻媒体中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人物，以点带面式地展示 20 世纪中国新闻传媒的精神风貌和气质个性。”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上述指导思想在书中得到了贯彻。《20 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已经在某些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特色之一：体现努力创新与严谨求实的统一。

《20 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的创新努力，一是体现在定位理念方面。其定位的要旨是：紧扣媒体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发生的影响，做到如前所述的某一方面的“不求”和另一方面的“但求”：不求对媒体的全面描述，但求对其灵魂的抒写。换言之，既要有所不为又要有所为。即对于 20 世纪中国新闻史中的其他诸多内容不涉及，只涉及其中的有关新闻媒体状况的内容；对于一般的新闻媒体不涉及，只涉及影响（或从反面影响）过中国的那部分具有

代表性的媒体；对于新闻媒体的描述，不求有头有尾、面面俱到，在叙写过程中更侧重于展示媒体的灵魂。众所周知，媒体的台前幕后，活跃着一群群新闻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根据本人的理解，媒体的灵魂即活跃于媒体中的人物及其灵魂。写媒体的魂，写媒体中人物的魂，这一定位理念，无疑有其独到之处，体现出了作者的某种创新精神。

读完全书，我认定：《20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史学研究方面的专著，新闻史学学术专著所必备的寻根探源、广征博引、史实考证以及系统完整等等特点，它往往并不具备或并不完全具备。它走的并不是以史带论或史论结合的路径。总而言之，不能以纯粹新闻史学学术著作的标准来衡量与要求它。然而，它又不是20世纪有影响的新闻媒体的汇编，也不是媒体个案及个案分析的集成。它是一本自成体系的、讲究严谨求实的书，是一部相当忠实地记录20世纪中国新闻媒体发展历程的著作，字里行间透映出史的深邃眼光，其行文表述经得起仔细推敲，且很耐读。

《20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的创新努力，二是体现在框架结构方面。全书的框架结构，是循着时序搭建起来的，在这一点上，相对于传统的做法似乎并无突破；但它又是由一个个新闻媒体支撑起来，并连缀成有机整体的。这就构成了它的独特之点。媒体是全书的凝聚点和落脚点。文字从这里发散开去，兼及人物、事件、现象，又在这里回归、收拢。书中每一节的标题，以中间加冒号的两个短语（或短句）构成；在后一个短语（或短句）中，无一例外地都包含了一个在特定时期曾经在历史的大书上刻下过深深印痕的新闻媒体的名字。在书中，新闻媒体是贯穿始终的红线，是关键词，同时也是作者关注的重点。这样的标题制作方式，本身也有着创新的意味。

特色之二：体现出开阔视野与专业眼光的统一。

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大地上的新闻媒体和媒体事件不计其数。在几乎是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进行筛选，把它们摄入到有限的篇幅中去，力求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认同，这并非易事。本书在筛选过程中，体现出了作者的开阔视野和专业眼光。作者熟悉20世纪各个时代对历史产生过不同程度影响的新闻媒体和媒体事件，做到重要的绝不遗漏、入选的都有充分依据。应当说书中所作的选择是较为精当的，评判和把握是准确的。例如，在对20世纪

影响中国的媒体加以列述时，围绕《万国公报》、《苏报》、《民报》等媒体而展开，不仅突出了重点，显得要言不烦，而且与当时中国新闻界的实际情况也是吻合的。第三章写“夜幕下的民间办报”，其中的第一节，用“黑白色的自由”对《申报》当时的状况进行概括，显得准确而到位。第二节以“沉浮百年‘大公’梦”描述《大公报》，第三节以“大‘世界’的市民情结”同时涵括《世界晚报》与《世界日报》，第四节以“言论罹难的两个案”并叙《生活》和《新生》周刊，也都言简、意明、精到。专业眼光的一个重要方面，往往就体现于这种分寸感好、精确度高的描述与概括之中。

特色之三：体现出学术内涵与可读因素的统一。

《20 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是有学术内涵的，具体表现为：一是不满足于铺陈史料，不停留于前人已有观点，而是力求对史料和前人观点进行学理性的观照、思考。二是坚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新闻媒体、媒体事件以及相关人物，看待新闻史上的某些发人深思的现象，所作的评价力求准确、科学、严谨。不因为以往发生过很大作用的政治原因，而贬低人物、事件在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因为上述同样原因而搞矫枉过正、片面深刻。三是无论运用史料还是他人观点，都有充分的依据，令人信服。虽然它讲究趣味性和奇异性，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并未采用不负责任的戏说的态度、方法。在行文中，作者广征博引，并一一交代了出处，体现了一种严谨负责的态度，从而与编写演义、与插科打诨划清了界限。

在力图具备一定学术性的同时，《20 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还致力于增强可读性。在该著中，可读性因素得到了彰显。作者总是努力地去发掘许多新闻史史料中的故事因素。其实，新闻史史料中并不缺乏故事性因素，关键是要做认真发现和发掘的工作。《20 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的作者正是这样做的。例如，在第一章“世纪初的媒体惊梦”中，第三节所述“媒体‘文字狱’第一案：《苏报》案”，既是“文字狱”，又是“第一案”，毫无疑问有着极强的故事性。只要依据事实秉笔直书，就可以写得足够吸引人。再如，在第六章“‘大跃进’前后的狂热与反思”中，作者选取“左叶事件”写《文汇报》，以关于“红薯亩产 251822 斤”的离奇报道展示可见一斑的媒体狂热，在令人忍俊不禁的过程中启发读者对历史上反常现象的深入思考。第七章“‘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灾难”，其中的第一节由“燕山夜话”切入写《北京晚

报》，第二节、第三节直叙“文化大革命”中新闻界之怪现象，都写出了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闹剧以及闹剧演出过程中媒体的命运多舛。相信读者在看完以后不会一笑而了之。第九章“世纪之交的探索与辉煌”中有一段记述香港凤凰卫视的文字：“凤凰卫视不仅在华人社会具有相当的引导价值，拥有重大新闻的‘第一解释权’。甚至在国际间，在西方世界的重量也非同小可。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小布什突然询问白宫负责公众传播的高级官员：若战争爆发，中国香港地区的凤凰卫视会不会直播？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小布什不置可否。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生在战前也两次破例接受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赵一力的独家专访。最令华人骄傲的是，凤凰卫视受到了美军的特别邀请，随军去战争前线采访，并成为唯一登上向伊拉克昼夜发射导弹的‘小鹰号’的华语电视媒体。”

《20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的可读性因素还表现在：对新闻史史料作具有可读性因素的表述。这种努力，既表现在书稿的正文中，也表现在章节的标题中。以章节的标题为例。第一章“世纪初的媒体惊梦”，其中第二节的标题“‘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报》”，颇让人感到别有意味。在第二章“新报刊的文化启蒙”中，第三节“屠刀下的‘萍’‘水’相逢：《京报》及其他”，耐人寻味。第五章“黎明前的激情岁月”中，第一节标题“从窑洞走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节标题“从瑞金走向世界：新华通讯社”，使媒体带上了拟人化色彩，文字的可读性陡增。而历史图片的适当运用，则发挥了与文字相得益彰的作用，这对于增强全书的可读性也是有所帮助的。

综上所述，《20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在寻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契合方面作出了艰苦努力，也颇有成效。但它也并不是没有可以继续改进的地方。在每一章的前面，以适当的文字交代下面所提到的媒体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似乎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做，便于读者从更深层次解读媒体何以生存、如何发展和怎样表演的必然性。当然，这都只是白璧微瑕，之所以指出，是因为希望该著能更加完美。

相信云明博士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是为序。

2007年11月8日于南京

目 录

第一章 世纪初的媒体惊梦	1
第一节 “穷则思变”：《万国公报》	1
第二节 “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报》	10
第三节 媒体“文字狱”第一案：《苏报》案	18
第四节 革命与保皇：《民报》之命运	26
第二章 新报刊的文化启蒙	37
第一节 “打倒孔家店”：《新青年》	37
第二节 “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	49
第三节 屠刀下的“萍”“水”相逢：《京报》及其他	55
第三章 夜幕下的民间办报	65
第一节 黑白色的自由：《申报》	65
第二节 沉浮百年“大公”梦：《大公报》	74
第三节 大“世界”的市民情结：《世界晚报》与 《世界日报》	83
第四节 言论罹难的两个案：《生活》与《新生》周刊	89
第四章 抗日烽火中的救亡舆论	97
第一节 “有理、有利、有节”：《新华日报》	97
第二节 历史的纠结：延安《解放日报》	106
第三节 “西方夜谈”：《新民报》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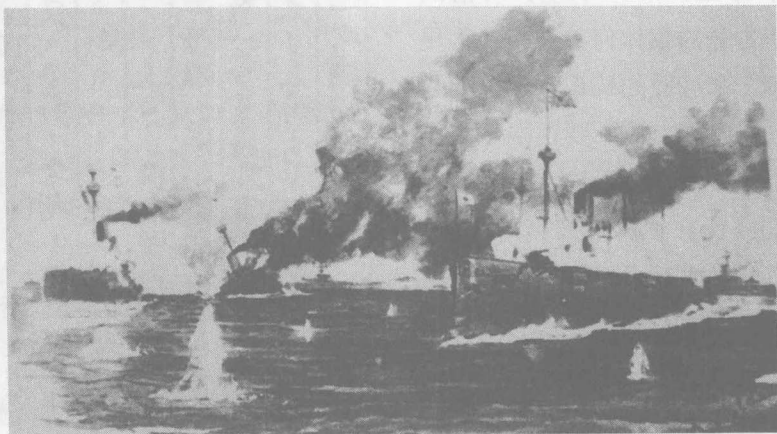
第五章 黎明前的激情岁月	122
第一节 从窑洞走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2
第二节 从瑞金走向世界：新华通讯社	132
第三节 人民的声音：《人民日报》	140
第六章 “大跃进”前后的狂热与反思	146
第一节 “左叶事件”：《文汇报》及其他	146
第二节 “红薯亩产 251822 斤？”：《南方日报》	155
第三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解放军报》及其他	164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灾难	175
第一节 “燕山夜话”：《北京晚报》及其他	176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新闻界之怪现象	181
第三节 异样的宣传报道：《辽宁日报》及其他	189
第八章 开放后的改革号角	196
第一节 真理越辩越明：《光明日报》	196
第二节 渤海事件：《工人日报》	204
第三节 “三色”报道：《中国青年报》	209
第四节 春天的故事：《深圳特区报》	214
第九章 世纪之交的探索与辉煌	222
第一节 万众瞩目的地带：中央电视台及《焦点访谈》	222
第二节 将切割的华人世界聚拢：《凤凰卫视》	233
第三节 快乐中国：湖南卫视	238
后 记	246

第一章

世纪初的媒体惊梦

第一节 “穷则思变”：《万国公报》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处于寻寻觅觅而又前途未卜的状态，自外而来的新因素打破了昔日天朝上国的宁静，传统与变迁在相互渗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个泱泱大国。甲午战败，维新变法，在这场混沌之中燃起了一点星火，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开始遭到怀疑。



▲ 甲午海战，致远舰被击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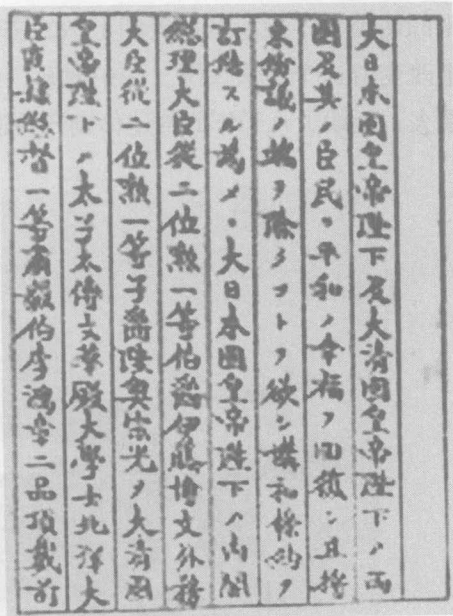


▲ 康有为

授工部主事。从此，“康有为”成为一个谈论维新变法运动无法回避的名字。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不断用坚船、利炮、火枪、商品啃噬着沉睡的中华躯体，林则徐、魏源们醒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们醒了，建水师、办工厂、兴学堂，可惜的是，中华古老的躯体何其庞大，零星的“精英”和片面的认识不足以唤醒她挥动一只胳膊，更不要说阔步向前了。三十年洋务，败于日本，中国的士大夫们或死守“尊王攘夷”，高呼纲常、节气；或有爱国之士，感于甲午之痛却不知救国之方，昧于知彼亦昧于知己，不见长进。站在历史转折的当口，眼望深深的庙堂，康有为心痛着，也期待着……

1895 年 4 月，《马关条约》签订，举国哗然，中国不是败给西方强国，而是败给明治维新后的“东邻小国”日本。当时，该年的科举会试刚刚结束，一位来自广东的南海先生踌躇满志，比起自身的前途，他更关心着这个国家的命运，此前他的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已经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间流传。5 月 2 日，他以一纸一万八千余言的万言书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余人联名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是为“公车上书”。第二天，他中进士，5 月 11 日



▲ 《马关条约》（日文）正本首页

“一个世界的隐喻一经消失，这个世界便告灭亡。一个时代变成另一个时代，其余的一切都被弃置一旁。”（奇博尔德·麦克利《隐语》）也许变革的脚步势不可挡，但是，要开启一个闭关多年的国门需要强大而持久的力量，这种裂变往往由外而发，但最终要由内而作。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似乎在阵痛中触摸到了这种内在的律动。

多年来，康有为带着他的弟子们奔走于大江南北，传布变法之思想，38岁那年，他站在皇城脚下，不禁想起自己22岁那年“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想起25岁见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①。而今日之中国处处有洋人的影子、西洋的玩意儿，甚至是洋枪洋炮带来的深深创伤。于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不断地涌出强烈的呼唤：要救国！要自强！要变法！他来回踱着，精心构思着《上清帝第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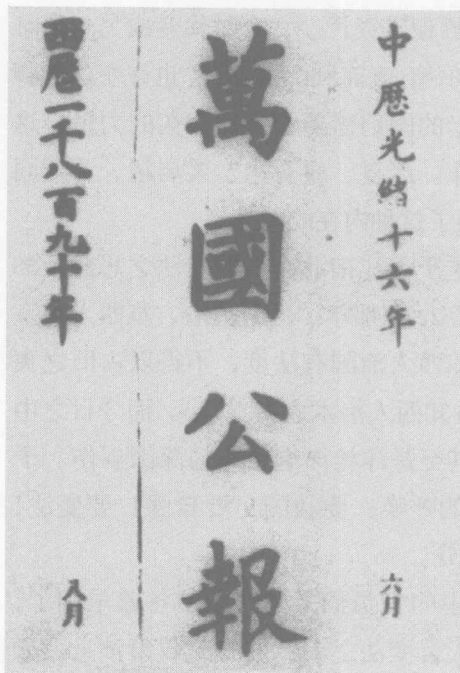
不知不觉间，天已微白，高宅大院里的官员们又要开始准备着早朝了，不知今天皇帝能听到什么谏言呢，可有人言变法之事？要知此政事消息，如无消息灵通人士，只有看《京报》了。一直以来清政府实行严厉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奉行“庶人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②塑造了一个话语真空。列强入侵之后，作为传播工具的新闻报纸仍只有《京报》，尽管这是国人和外界唯一的政事消息来源，但它获得的评价是：“从新闻的角度来说，京报是最不中用的新闻报纸，里头只是政府认为对自己有益、应该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③当然这是外国人的评价，因为此时在英法等资产阶级国家，报业已经历了同政府几个回合的言论自由较量，开始进入现代报业时期。对于偌大一个国家的“沉默”，他们感到无奈。为了商业利益，他们急于改造这个不开化的民族，作为思想改造者，他们积极作为，于是中文近代报刊的历史、中国土地上近代报刊的历史均由外国人揭开了序幕。

当然，《京报》是无法使中国的士大夫们清醒的，而正是这些外国人创

① 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197页。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③ 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 上海《万国公报》

办的报纸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知己之“穷”，然后“思变”。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写进了保证传教士在各地从事传教活动的条款，此后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时期，^①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办报。到了 19 世纪末叶，已经形成了以英美报刊为主的在华外报网络，少数国人自办的报纸仅出现在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的汉口、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康有为早年在上海就大量购置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新书，并订了《万国公报》，该报对其影响极大，以至于维新派所办的第一份报纸就和它同名。

《万国公报》是由《中国教会新报》直接改名而来，是 1868 年 9 月 5 日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早期是一份宗教性报纸，主要目的是宣传基督教，加强教会之间的联系，后宗教内容减少，世俗内容增多。^②1874 年 9 月 5 日改名《万国公报》，其用意是：“所谓万国者，取中西互市各国商人云集中原之义；所谓公者，中西交涉事件，平情论断，不怀私见之义。”^③报纸登载大清国事、大美国事、大英国事等各国近事的报道，并大量介绍西国制造、机器、军械、电线、天文、地理、格致算法各学，曾于 1883 年停刊，1889 年复刊后隶属广学会，复刊后的报纸以评论为主，刊发了大量评论中国时局、鼓吹中国变法的文章。“以其对中国的贡献而言，则于变法鼓吹以及格致知识之介绍为功甚大。”^④该报在中国发行长达 28 年之久，影响深远。

中国人接触西学，都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这也是在华外报的一个主要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40 页。

② 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 2004 年版，第 10 页。

③ 同上书，第 13 页。

④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 页。

宣传内容。康有为也曾“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记、诸人游记皆涉焉”。^①而《万国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除格致、教义之外还引入了社会科学思想。从19世纪70年代始，该报广泛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林乐知在《中东战纪本末》一文中提倡君主立宪政体，在《满招损谦受益是乃天道》一文中建议中国人应有“自主之权”，即资产阶级民权，对议会制度，则从组织形式到理论基础都谈到了，它一而再，再而三把他富民强国的主张，明明白白地说了又说，引起了当时有志之士的普遍注意。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就把《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他的大弟子梁启超亦深受影响，后作《变法通议》，其中有些主张就来源于此。《万国公报》还提出“利用出版物影响这个古老帝国”，使之“思想开放起来”，维新派日后以办报广开舆论的做法可以说由此习得。

戊戌年，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富国养民策》、《新政策》等书一般都是先在《万国公报》连载，再由广学会出版单行本。光绪帝在读到该报一些文章后，也“大购西人政书，览之。遂决变政。”^②而且要求上海招商局按期呈览。由于皇帝和维新派的倡导，该报销量大增。

《上清帝第三书》几经辗转终于上呈给光绪皇帝御览了，此时慈禧太后已住进修复好的颐和园，过着半隐退的生活，24岁的年轻光绪帝面对的是割地赔款的烂摊子，在《马关条约》上盖上玉玺的耻辱还使他胸口隐隐作痛，他也在思索着，而这本折子让他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显然他并不认为恪守祖宗之法可以雪耻强国，而对于改革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使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欣喜若狂。

但是，皇帝远在金銮殿上，而自身却囚于书斋，空言变法是没用的，手中无权，身边无人。走出书斋，康有为抬头仰望，乌云遮日，是啊，想要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要待民智开，舆论明啊。作为知识分子，要争取和扩大自身的权利，从而提高政治活动的的能力，就要形成组织，创办学会；当民智未通、风气未开之际，一些官僚士子还不易认识学会的重要性，这就要依靠舆论宣传，办报纸。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② 马金华：《〈万国公报〉与维新派》，《东方论坛》，2001年第1期，第40页。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份报纸，为了起到有效的宣传作用，他们花了不少心思，首先是报名，名为《万国公报》，正是那份曾经深刻影响过他们的报纸，该报在上海销路很好，显然这种雷同效法的目的在于借其名传之，借熟传新，以利推广；在刊式上又与《京报》相似，并常常夹带在《京报》中附送，不收报费，遍送士大夫贵人，并辅之以“游说”、“讲辩”，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该报每册有论文一篇，多出于梁启超、麦孟华之手，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对开矿、铸银、制机器、造轮舟、筑铁路、办邮政、立学堂、设报馆，以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都有论列。^①如此一来，迅速在京城传播开来。

舆论渐明之后，他们便开始募集资金，筹议立会，由于宣传得法，前来募捐者甚多，其中不乏朝廷官员。不久强学会便告成立，会址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也就是《万国公报》所在地，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国内建立的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引起了朝廷的警惕，顽固派更是将此视为眼中钉，10月有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恶而议劾”^②。11月中旬，为了回避结社立会的禁令，学会改为“强学书局”，书局者，仅为一个出版机构，可见行动之中颇多策略。

虽然一路迂回，康有为仍然步履坚定，考虑到北京强学会规模初具，但在天子脚下难以避免摩擦，同时为了扩大影响，他希望在“南北之汇，士大夫所游走”，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上海设立上海强学会。10月17日，他经天津到南京，拜会张之洞，虽然在北京他拒绝了李鸿章的捐款，但却相信能说服南方的这位洋务重臣。他在南京住了20多天，和张之洞“隔日一谈”，使得这位洋务大臣拨款1500两白银兴建上海强学会，为当时捐款最多的一位，《上海强学会序》还由他署名，但是这位深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纲常不容摇撼的洋务重臣不可能支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把老祖宗的纲常变成洋鬼子的议会，他将自己的旧僚汪康年调来“主沪会”，就是希望能把强学会笼为己有。

11月中旬，康有为带着捐款来到上海，马不停蹄地筹建上海强学会，选定上海跑马场西首王家沙一号立足，在章程中明示“专为中国自强而立”，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页。



▲ 清末，一位爱国人士画的时局图，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野心。图中熊代表俄国，虎代表英国，蛇代表德国，蛤蟆代表法国，太阳代表日本，鹰代表美国。

“求中国自强之学”，着重说明设会的目的是为了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广“圣教”，“周世用”。也就是说，利用学会组织，联结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讲求变法图强，挽救世变。并规定了四件要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①并电调门人徐勤、何树龄来上海办报。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0—192 页。